

中國經學

ZHONGGUO JINGXUE

第一輯



主編◎彭 林

經學的時代意義◎杜維明

重印《清經解·清經解續編》序◎徐復

皮錫瑞《經學歷史》周注補正◎陳鴻森

人偶——偶談之餘終篇◎戶川芳郎

顧頡剛的經學觀◎林慶彰

《尚書·金縢》與楚簡禱祠◎李學勤

士禮冠義小記◎朱繼海

《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整理本平議◎呂友仁

《緇衣》簡本與傳本章次文字錯簡異同考徵◎虞萬里

《大戴禮記》歷代校釋辨誤◎方向東

上博藏簡《周易》爲西漢古文經本子源流考◎黃人二

“孔子作《春秋》”說的形成◎鄭良樹

《春秋》學中的“日月時例”◎趙伯雄

論《春秋》學的時代使命——並簡介我對春秋經傳褊裕問題的研究◎黃彰健

《左傳》疑義新證（昭公篇）◎趙生群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鄧國光

中國經典詮釋的空間——理雅各英譯《論語》批評孔子析論◎龔道運

編後記◎彭林

徵稿啓示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中國經濟學

— 第一輯 —

主編◎彭林

進書題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经学. 第一辑 / 彭林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33-5737-8

I. 中… II. 彭… III. 经学—研究—中国
IV. Z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245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20 字数: 300 千字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500 册 定价: 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讀書為從

經學始

康樸



刊石經，講三禮；
精一危微，
道心因時而立。

劉桂生 敬題

2005年9月25日

站在經濟學研究的現階段上，我們第一，要先懂得經濟是什麼？第二，要懂得什麼叫做經濟？第三，要懂得經濟上有些什麼派別？第四，要追究這些經濟學派為什麼會發生？

右摘錄周予同先生一九三六年語，以賀

《中國經濟學》創刊

李學勤

二零零五年九月

中國經濟學 名家選集

劉家弘敬題

編委會（按姓氏筆劃排列）

- | | |
|------|--------------|
| 池田秀三 | 京都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部 |
| 林慶彰 | 台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 |
| 夏長樸 | 台灣大學中文系 |
| 陳鴻森 | 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 |
| 喬秀岩 | 北京大學歷史系 |
| 單周堯 | 香港大學中文系 |
| 彭 林 | 清華大學歷史系 |
| 虞萬里 | 上海社科院歷史所 |
| 趙伯雄 | 南開大學古籍所 |
| 鄧國光 | 澳門大學中文系 |

■主編 彭 林

目 錄

經學的時代意義	1	杜維明
重印《清經解·清經解續編》序	5	徐復
皮錫瑞《經學歷史》周注補正	9	陳鴻森
人偶——偶談之餘終篇	51	日戶川芳郎
顧頡剛的經學觀	66	林慶彰
《尚書·金縢》與楚簡禱祠	91	李學勤
士禮冠義小記	97	朱繼海
《十三經注疏·禮記注疏》整理本平議	100	呂友仁
《緇衣》簡本與傳本章次文字錯簡異同考徵	132	虞萬里
《大戴禮記》歷代校釋辨誤	172	方向東
上博藏簡《周易》爲西漢古文經本子源流考	186	黃人二
“孔子作《春秋》”說的形成	197	鄭良樹
《春秋》學中的“日月時例”	208	趙伯雄
論《春秋》學的時代使命		
——並簡介我對春秋經傳禘祫問題的研究	224	黃彰健
《左傳》疑義新證（昭公篇）	233	趙生群
蘇輿《春秋繁露義證》初探	266	鄧國光
中國經典詮釋的空間		
——理雅各英譯《論語》批評孔子析論	288	龔道運
編後記	308	彭林
徵稿啓示	312	

經學的時代意義

杜維明

在資訊和知識社會中，變動不居是常態；科學、技術、思想、觀念瞬息多變，甚至哲學也流於風尚。進步和發展是國際社會努力的目標，但生產力的增加不一定給人民帶來富裕，科技騰飛也未必給人民帶來福祉。能源枯竭，環境污染，疾病流行，貧富懸殊，社會解體，暴力和恐怖事件層出不窮，使得緊張、憂慮成為現代文明的特色。經濟全球化導致同質化的過程，文化認同的要求應運而生，世界各地都湧現出文化多樣性的呼聲。相對主義成為人文學者不言而喻的基本假設，任何傾向本質主義或永恆不變的理論都會受到抨擊。人類當前面臨的挑戰很多，我們是否已逐漸喪失了存活的能力，正走向一條自取滅亡的不歸路，已不是危言聳聽了。如何協調人與自然的關係，如何化解世界各地的暴戾之氣，如何維持社會的基本安定，是任何一個有全球視野的公共知識分子都不能回避的現實問題。

我認為，“精神轉向”，也就是汲取“軸心文明”（希臘、希伯萊、印度、中國）的源頭活水，重新進行宗教反思，探索人類的生存之道很可能成為 21 世紀的哲學趨勢。超越“西方啟蒙”所代表的反宗教和去自然的心態是當前歐美學術界的共識。儒家的人文關懷是以活生生的具體的個人為起點，紮根身體、家庭、社群、人類和世界，而又以修身為本，通過“推己及人”的實踐理性，打破個人主義、家族主義、地方主義、國族主義，乃至人類中心主義的思路。這條學做人的道理是生命的學問，可以為全球社群重建包含宗教和自然在內的人文精神。

後現代主義為我們解構了許多根深蒂固的觀念——自我、社會、國家、民族、文化、歷史，但由天文、物理、化學、地質、生物等科學共同書寫的宇宙的創生，地球的形成，物種的演化以及人類的出現這一宏偉敘事迫使我們重新思考何為人，

如何知，如何行，信仰什麼，能信仰什麼，人生目的何在等一係列從孔子、蘇格拉底、摩西和釋迦摩尼的軸心文明時代就不斷追問的價值問題、意義問題。直到今天，人的自我知識、自我瞭解、自我認同與自我實現還是個無法破譯的謎，伴隨人生之旅的謎。這也是為什麼智慧之書，如經典，不死的理由。

中華民族有古有今，是一個歷史意識深厚，典籍浩瀚的民族，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提出了文明的繼承與創新的問題。自鴉片戰爭以來，一百六十六年的變化，讓我們不斷地對這些問題進行再認識，再思考。“中國”應是體現中華文明的政治概念，沒有五千年的歷史傳統，也就沒有現代意義的中國。經濟和政治中國必須以文化中國為基礎才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生命力及“協和萬邦”的說服力。《大學》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念和宋明儒學“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的宗教情懷，都是儒家人文精神的展現。我們從事經學研究的讀書人，本著以學術為天下公器的原則，對這份人類的共同遺產進行保管、整理、修繕、解釋、發展和弘揚的工作，是為“自立”也是為“立人”。

儒家傳統和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結了不解之緣。排斥、擺脫或揚棄儒家傳統，重新塑造中國文化的新認同是五四運動時代知識分子努力的目標。他們在意識層面極力引進自由、人權、科學、民主等現代西方理念，但是，這些反傳統的知識精英又都是自尊自重的愛國主義者，在他們潛意識層的心靈積習中瀰漫著儒家文化的因素，因此他們不可能也不願意以西學為國學。作為當時傑出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關切政治，參與社會，注重文化。他們的生命形態、價值取向和儒家傳統的“弘毅之士”一脈相承，因此他們不能否定儒家的理想人格，也無法離開儒家的意義世界。不必諱言，他們在“詆孔反儒”的前提下，塑造了現代學術的規模，提出了新問題，發現了新材料，開拓了新視野。可是，他們所耕耘的國學田地雖然以精巧細緻的專論著稱，但缺乏“上下與天地合流”的剛健之氣，沒有為當時“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的思想大潮提供參照。

經學研究有深刻的政治含義，也有實用價值。但經學研究本身即是目的，應該有獨立自主的發展空間。既然經學是中華民族文化認同的核心課題，支持大批學人從事經學研究應是學術界的基本承諾。是否有成效，應根據嚴格的學術標準，不應攙雜非學術的考慮。不過經學研究者，特別是經學研究的領導，應有深造自得的體悟和高瞻遠矚的視野，也應關心時代的脈動。

試想，如果五四精英能以救亡圖存的悲願效法印度的拉達克里新納、猶太教的布伯、基督教的田力克、佛教的西穀啟治或伊斯蘭的納瑟，充分體認自己精神文明的核心價值，面對西方啟蒙人文主義的挑戰作出創見性的回應，而不是採取“拋卻自家無盡藏，沿門托鉢效貧兒”那種拾人牙慧的辦法，中國學術和思想界也許可在“整理國故”的基礎上產生凸顯原創性的經學思想。當然，不回到那時“古今中西之爭”的語境，是無法理解傳統和現代，西學和中學、革命和保守，進步和落伍之間的張力和矛盾，也不能理解那時知識分子憂國憂民的苦心。“尊孔讀經”被政治化，成為維持既得利益的工具，引起知識界的強烈反彈，連線裝書也成為愚昧無知的象徵。在極端反傳統的氛圍中，有哲學內涵的經學怎麼會有發展的機緣。

雖然如此，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和經學有密切的關係。康有為、章太炎、胡適、馮友蘭都詮釋經典，為經學作出了貢獻。不過，今天我們應該暫時擱置漢學宋學、經學子學、官學私門、考據義理，乃至今文古文的二分法，首先把注意力集中在儒家六經的全貌。經學不只是文字、版本、校勘、訓詁，也不只是注疏和詮釋，經學所體現的是儒家傳統的核心價值、意義世界和人文精神。因此，即使我們判定“六經皆史”（不僅章學誠，王陽明也有這種說法），我們還要充分認識到經學所研究的課目必然包含是什麼、為什麼、如何知、如何行、如何信，是非、對錯、善美之類的問題。“實事求是”和“經世致用”並不足以涵蓋六經的全部內容。把“六經皆史”理解為求真，又以“真”為實證主義所強調的“事實”，那麼不只經學的價值、意義和精神無從說起，也許連中國傳統史學的基調也無法辨識了。中國史學大家如司馬遷、劉知幾、司馬光和章學誠，不僅求實致用，而且有堅定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和終極的關懷。他們涉及的領域包括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特別是美學、倫理和宗教。他們所探究的既是客觀真理，也是文化價值、人生意義、人文精神。

在價值、意義和精神層面上，六經展現了既精湛又全面的人文景觀：《詩經》是以情為本的美感經驗，《尚書》是以德治為根的政治實踐，《易經》是以“乾道變化”為主軸的本體智慧，《禮記》是以“親親、仁民、愛物”為基礎的社會關係，《春秋》是以義為褒貶的歷史判斷，《樂記》是中和境界的體現。它們共同構建的是人格全面發展的生命哲學與資源豐富而又井井有條的理想王國。六經的做人道理至少涉及四個不可分割的面向：（1）個人身心靈神的融會貫通；（2）個人與社會的健康互動；（3）人類與自然的持久和諧；（4）人心與天道的相輔相成。人固然

是理性的動物、會使用工具的動物、能運用語言文字的動物，但六經所期待的人還能創造價值，追求意義，“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

目前，建立中國文化的主體性是學術、知識和文化各界人士所關注的共業。具有開放性和批判性的主體意識必須莫基於學術。經學是國學中最有民族特色也最博大精深的學問，努力使經學成爲顯學應該是文化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的共同心願。

重印《清經解·清經解續編》序^①

徐 復

先聖孔子及其所創儒家學說，申孝悌，敦禮義，易風俗，育人才，明人倫之本，隆世事之規，為後代所崇尚久矣。雖有今、古文之別，漢、宋學之爭，然歷兩漢、魏晉、南北朝、唐宋元明清，綿延而不斷，至今已有二千餘年。研究儒家經書之學即經學，自漢代以來，即為中國傳統學術之主幹也，而古代之學問家最稱用力焉。斯為學術之大勢也。經學研究，要言之，以漢、宋及清代最具特色。漢代係儒術獨尊、經學奉為正統之時代，有今、古文之別，以董仲舒、馬融、鄭玄、許慎輩為重要代表，或闡微言大義，講陰陽五行；或重訓詁考證，明典章制度。宋代嬗變，世稱理學，以講理欲心性為尚，有濂、洛、關、閩之異，然主旨不出儒家範疇。主要人物有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朱熹及陸九淵等。發展至清，一改元明以來衰微之勢，呈現復興之象，乾嘉學術如日中天，碩果累累，超邁前人，概為整理總結古代學術之鼎盛時期，世稱“經學復盛時代”。斯為經學之大勢也。

清代經學承鼎革之後，基於對明末空談之反省，仁人志士如顧炎武、黃宗羲等，痛感“天下生員，不能通經知古今，不明六經之旨，不通當代之務”，故而倡導“明辨經學源流”、“要以六經為根底，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以“通經致用”為號召，經學為之一振。加以“崇儒重道”之時策，“禦纂諸經”之導向，文獻資源之開發，考據學風之推播，至乾嘉之世已湧現惠棟、戴震、錢大昕、凌廷堪、段玉裁、王念孫、焦循等經學大師。學者輩出，著作繁夥，阮元深感“他年各

^① 2005年夏，鳳凰出版社重印《正續清經解》，以此文冠諸卷首。為廣其傳，謹徵得徐先生同意，發於本學刊。

家所著之書或不盡傳，奧義單辭淪替可惜”，而效《通志堂經解》之所為，有彙刻各家論著之舉。阮氏所輯《皇清經解》，亦名《學海堂經解》，由其門客與弟子嚴傑、夏修恕、阮福等負責編校、監刻，成書於道光九年（1829）。該書大體以作者先後為序，凡見於割記、文集者，亦依次編錄。共選入顧炎武等 73 人所著 183 種，計千四百卷。光緒之時，王先謙以為續出者尚多，且先出而未見收者亦復不少，故繼踵阮氏之志，於前書所遺之外，增補後出佳作，成《皇清經解續編》1400 卷，收錄 110 人 209 部著作。亦名《南菁書院經解》、《續清經解》也。

兩部《經解》共收入 160 餘人之近 400 種著作，實集清代經學研究之大成也。就其內容論，涉及經義家法、名物訓詁、典章制度、天文歷算、山川地理、校勘辨偽等衆多方面。就學術論，經學大家之作幾無所遺，於此可覘有清一代之學術風貌。此不俟餘喋喋也。前之專論清代經學之作已復不少，自清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方東樹《漢學商兌》、唐鑑《國朝學案小識》等肇其端，繼有章太炎先生《馮書·清儒》，劉師培《近儒學術統系論》、《清儒得失論》，羅振玉《本朝學術源流概略》，徐世昌主編《清儒學案》，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等論其詳，近世之張舜徽《清代揚州學記》、《清儒學記》，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趙航《揚州學派新論》等，亦時見卓識，並為清代經學研究可取之資。此《清經解》正續編為研究傳統文化不可或缺之資源，不言而明，然從學者研讀之際，或以為宜措意者尚有數端：

首曰辨學術流派，而以辨其特點為重。就流派而言，為學派命名，乃中國學術之傳統，或以學派創始者，或以所處時代，或以所在地域，或以學派之特徵。如清學之吳派、皖派之稱，似始於章先生《馮書·清儒》：“其成學著系統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吳，一自皖南。吳始惠棟，其學好博而尊聞。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異也。”此後梁啟超亦主此說，為治學術史者所沿用。依時間而論，清代初期，為經學復興之際，有重程朱理學之宋學家，有反空談、尚考據之漢學家，有黃宗羲所創浙東學派，有以顏元、李塨為代表之顏李學派，漢學、宋學並存，或以為呈考據與義理雙向詮釋之局面。清代中期，經學家以復興漢學為時尚，雖有吳、皖、揚學之稱，而並以考據為尚，主實證，重實事求是，共同開創乾嘉樸學興盛的局面。不絕如縷之今文學派，時以

莊存與所創常州學派為主將，得重經世致用之湖湘學者等推助，呈復興之象，劉逢祿、宋翔鳳及龔自珍、魏源等輩，先後以濟世、革新為號召，影響日盛，致使清代後期呈現出經學多樣化之局面。清代經學，豐富多彩，各時各地，不同流派，異彩紛呈，學人宜把握清學總體特徵，辨別各學術流派之特點。

次曰摒門戶之見，注意吸收各家之所長。義理與考據，本為學術之兩翼，相得而益彰。而有清一代漢、宋學之爭，此起彼伏，紛紜不已。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與方東樹《漢學商兌》為持漢、宋學立場，而宣揚自己、排斥對方之典型，有黨同伐異之病，無實事求是之風。阮元“儒者之治經，但求其是而已”之主張，或有助於破除門戶之見。今之從學者，當持客觀公正之心，兼收並蓄，吸取各家之所長，以期學術之進步。

再次曰求推陳出新。承繼學術傳統，恪守學術理念，宜重會通、求實，而以創新為第一要義。然創新又談何容易。即經學而言，清代為一學術高峰，為整理和總結古代學術之鼎盛時期，其成果當為今日研究之基礎。清人成果似有未及研析董理者，至有昔之老生常談，而為不學者矜為獨得之秘。而昔之所論，亦有囿於一時一地之局限，或為資料之不足，或因方法之未當，有待今之補苴匡正者。故好學深思者宜循序漸進，而至高屋建瓴，明學術之是非短長，斷學問之深淺高下，取精用弘，終期於發人之所未發也。而今世紀開元，文化昌盛，開闊視野，拓展領域，推陳出新，發展學術，此其時矣。

最末曰《經解》之文獻價值。前人論刻書，以為“上以壽作者之精神，下以惠後來之沾溉”，就總體而言，所論誠是。經學之書既夥，彙刻不易。而彙刻之傳世之功，則不可估量。虞君萬里於《〈正續清經解〉編纂考》一文所論“正續《清經解》非徒彙刻衆書，抑亦蒐采秘本、稿本公之於世。時推世移，稿本、鈔本存者寥寥，即或存者亦皆列為善本，難得一睹，是以《經解》之價值亦日見其高。”基於相關考證，持論允當，有助於對《經解》文獻價值之認識。而《經解》之於我國學術史研究，其價值亦不待言矣。

余舊有《經解》正續編各一部，取用稱便，或稱續編較正編為優，以收書更精當也。兩書收錄近四百種，有戴（戴震）、錢（錢大昕）、段（段玉裁）、王（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大師之作，卓識紛呈，為不能不精讀者；亦有泛泛之論，勝義無多，似可參閱或少閱者。諸書既有深淺高下之分，而初學者茫茫然難於抉擇，

二十年前余與友人有選編整理《經解》百種之議，後因故而延宕矣。今鳳凰出版社重視文化積累，有整理重印之議，華寶來問序，因念述往思來、鑒古訓今之義，聊書數語，以弁其端雲爾。

2005年3月15日於鳴謙室

皮錫瑞《經學歷史》周注補正

陳鴻森

內容提要 皮錫瑞《經學歷史》一書，於中國經學上下二千餘年的發展源流、正變得失，自據獨見，頗具特識。1928年，周予同先生復為其書作注，於皮氏所涉典實，尋其依據，發其義蘊，頗稱精核。顧周氏闕而未釋，或所注未盡是者，亦往往而有。本文條舉周注之失，並皮氏論說之未安者凡四十事，訂訛補闕，儻亦讀是書者之一助雲。

關鍵詞 皮錫瑞 《經學歷史》 周予同 經學

經學之有專史，蓋自皮錫瑞（1850—1908）《經學歷史》始。皮氏生當清季積弱之世，海內多故，世變日亟，變法改制之說紛起。此書撰於光緒三十一年（1805）秋，是年8月4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堂，詔准自丙午（1906）科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一時論者競言西法，至謂：“中國欲圖富強，止應專用西學，五經四書，皆當付之一炬。辦學堂者敢於輕蔑聖教，民立學堂，多無經學一門；即官立者，亦不過略存餽羊之遺。”^①皮氏以為法可變，而道不可變，亟言“經學不可廢”，以“孔子為萬世師表，五經即萬世教科書，世道人心，賴以維繫；綱常名教，確有持循。”^②蓋不勝斯文墜地之懼也，因著此書及《經學通論》，闡明孔門微言大義，以期漢時通經致用之效復見於世。

皮氏《經學歷史》一書^③，雖其中不無今文家成見，然於經學上下二千餘年發展

① 皮名振：《皮鹿門先生年譜》，上海：商務印書館，1939，101—102頁。

② 同上注，101頁。

③ 周氏注釋本流播甚廣，今據2004年中華書局新印本，以其書易得也。

源流、正變得失，自據獨見，頗具特識，固治經者必不可少之書也。周予同先生復爲之注釋，於皮書所涉典實，以至書籍、人物之等，莫不詳加注解，尋其依據，發其義蘊，俾讀者曉然易解。其注徵引繁富，頗稱精核，可謂皮氏之功臣矣。雖然，周氏闕而未釋，或所注未盡是者，亦往往而有。近爲諸生講論經學史一門，爰擇錄向所條記周《注》之失，並皮氏論說之未安者，凡四十事，以爲諸君讀是書之一助。適《中國經學》徵稿及餘，因復改訂一過，即以此稿就正焉。

2005年7月30日

經學開闢時代，斷自孔子刪定六經爲始。（1頁）

周《注》：“六經，或稱六藝，專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樂》今不傳，故去其一而曰《五經》。關於《樂》，經古、今文學家主張各異。古文學家以爲古有《樂》，因秦焚書而亡佚；今文學家則以爲古無《樂》，《樂》即在《禮》與《詩》之中。”

森按：周氏謂古文家稱古有《樂經》，因秦焚而亡。斯說不知何所本？實則漢人並無《樂經》因秦火而亡之說，此六朝駁言耳。按秦政焚書事，詳具《史記·秦始皇本紀》，李斯上奏但言：“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①據此，明秦焚禁者並無《樂經》；漢代劉向、歆父子、《漢志》、賈逵、馬融、鄭玄等，亦不見有秦焚《樂經》之言。蓋樂本無經，故先秦載籍絕不見稱述，即《荀子·樂論》、《禮記·樂記》、《史記·樂書》等論樂之篇，悉未稱及《樂經》。《漢書·禮樂志》言：“漢興，樂家有制氏，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大樂官，但能紀其鏗鎗鼓舞，而不能言其義。”^②正以樂原無經本，故制氏雖世爲大樂官，僅能記其聲律鼓舞，不能言其義也。沈約《宋書·樂志》乃

① 《史記》，中華書局點校本，255頁。

② 《漢書》，中華書局點校本，1043頁。